

博物館的擴張地界

巫靜宜

——台北故宮與巴黎羅浮宮之擴建、分館計畫與在地現象概述

博物館分館的建置在夢想起飛的一刻是值得興奮的，但在百事待興、眾人寄予厚望的過程中，更是一趟身負重任的築夢與實踐意志之旅。

在博物館相關的研究中發現「新博物館建置」的潮流在全世界發酵中，光是以Google搜尋「新博物館建構」(New Museum Construction)就會有多於10,200,000筆的搜尋結果。近幾年來，放眼國際間可發現許多知名的案例：例如英國泰德美術館的利物浦分館；美國古根漢博物館於西班牙畢爾包的分館；俄國冬宮(Hermitage)在倫敦(Somerset House, London)的陳列館；以及法國即將成立的龐畢度中心梅茲(Meiz)分館與羅浮博物館於朗思(Lens)的分館等等。這些國際型知名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逐步的建置

分館，顯示出「博物館分館建置」的新趨勢。而新博物館的建置，勢必對於各地博物館生態與在地的社群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究竟這些新設施、收藏和展覽對於當地有什麼樣的具體影響？博物館如何改進、以及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這對大眾和博物館來說都是一項體力、資金與時間的賽跑。(Martha Morris, 2004)

台灣，當然不能自絕於此趨勢之外。近十年來，許多民間機構將閒置空間再利用、或是藝文會館的開放也應運而生。雖然各個空間的規模與格局大小不一，但可看出連結區域文化與文化再生的用心。在博物館的「分館效應」之下，配合著展示多元化的逐步發展，同屬於國際型博物館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在原為中國清宮舊藏的展品特質之下延伸觸角，希望藉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於嘉義設立泛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分館計畫，來重新詮釋與認識亞洲文化，並活化台灣在亞洲文化圈的定位。相較於國際間同等級博物館分館的設立中，無獨有偶地發現到法國羅浮——朗思分館的建

置及規劃，與故宮南院的設立有其在基地考量、時程與願景等面向頗為相似之處：國立故宮博物院嘉義南部分院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選出美國 Antoine Predock 建築師事務所擔綱園區的建築規劃（圖1）；法國羅浮宮朗思分館則於二〇〇五年九月底的競圖決選中由日本 SANAA, Kazuyo Sejima et Ryue Nishizawa 建築師團隊勝出。博物館擴建與分館建置有許多龐雜的地域文化與博物館政策的個別差異性，礙於篇幅，本文並不嘗試探討複雜的政策性議題，而將主要概述兩個博物館在分館設立時規劃的現況，並介紹博物館分館與在地文化的現象省思。

從擴建到分館——向外擴展的歷程

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法國巴黎的羅浮博物館，從擴建到分館的計畫發展頗為相似：故宮從一九六五年在台北開放以來，經過幾次的擴建工程，雖然增加空間到現今的規模，但是就故宮珍品豐富的典藏相較於陳列室的展示面積，發現到能夠展出的藏品實在有限。再者，為因應現代博物館以觀眾參觀經驗為導向的需求，許多服務與教育推廣的空間也無法在現有的展場中拓展，因此擴建計畫於二〇〇四年實施，預計以二年的時間，在二〇〇六年完成擴建的工程。

而羅浮博物館，這所原為法國宮殿、國王居所、到成為法國王室收藏珍品展示的博物館，見證了法國

文化中重要的歷史發展與典藏。大羅浮計畫是法國總統密特朗於一九八一年獨排眾議所完成的一項創舉，屬於法國國家的重要文化建設，計畫中除了收回財政部使用的空間呂希留側翼 (Richelieu)，使得羅浮宮博物館的建築整體更為完整外，由貝聿銘先生所設計的金字塔建築更是一項眾所矚目的新建築物（圖一）。這個連結了新、舊建築結構體的巧妙設計，不僅僅是締造巴黎的新地標，從博物館的使用功能上出發，更可容納大量的

參觀者，讓管理更為有效而完善，進而達到親近與體貼大眾的善意。改建之後的展場除了提供更多的特展空間，也讓教育活動的規劃有



圖一 羅浮宮外觀一景（巫靜宜攝）

更多的可能性。

從故宮與羅浮宮的例子，可看出同原屬於宮廷典藏的兩座博物館，經歷了皇室私人收藏、向大眾開放成為教育場所，到親近觀眾、以大眾參觀經驗為導向的博物館政策。整個歷程中，博物館的擴建不只是建築本體在空間與尺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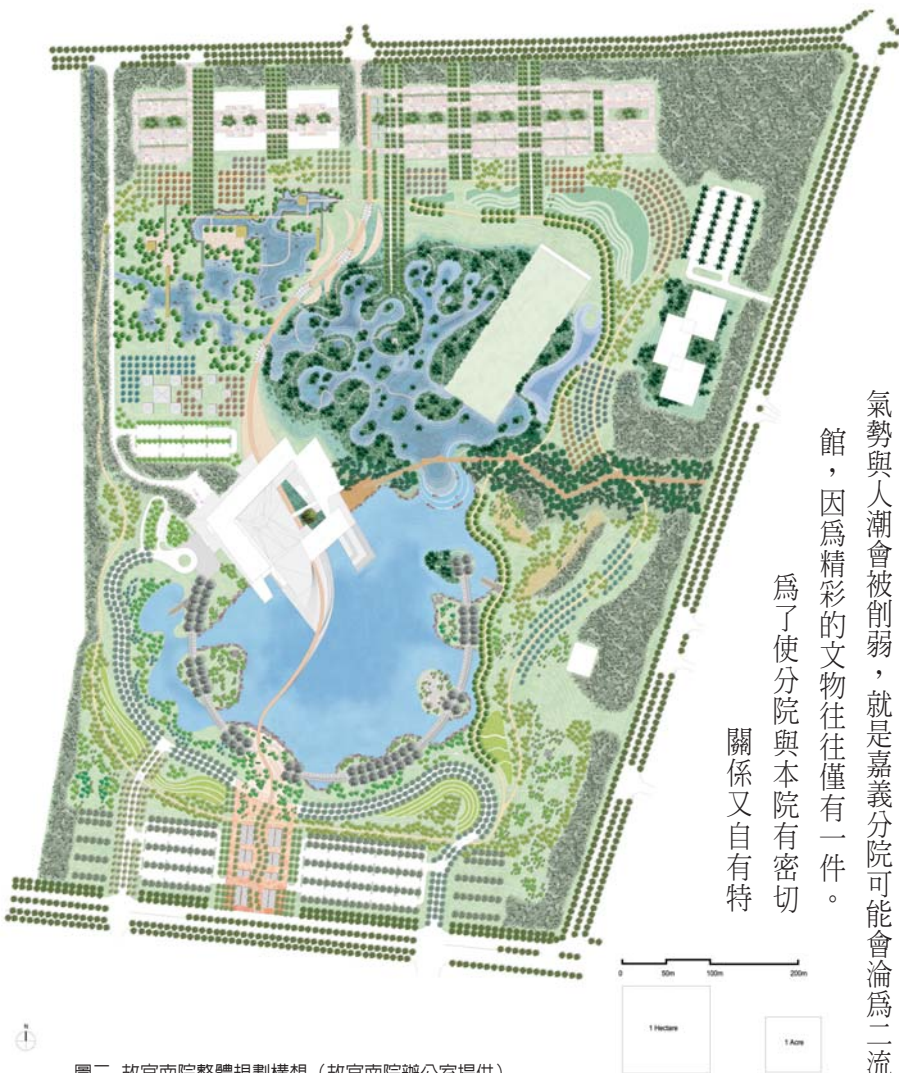
向外延伸而已，較深層的意義是館方如何展現其本身的特色，並且將這些特色以更人性化、更多元化的展示來教育觀眾。博物館一方面在本館思考如何以空間的成長來達到上述的目的，另外一方面也思考到如何透過在不同地點設立分館的建置計畫，呈現多元的博物館風貌，均衡地方發展的文化建設。

嘉義VS朗思——分館與地域的概況

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擁有約六十五萬三千件

的典藏品，在世界級的博物館中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另設南部分院的初衷原是要讓長期封箱的展品可以有更多展出的可能性，使更多的觀眾分享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但是如果將南部的分館定位為「單純複製一個故宮在南部的分身」，那麼，不是北部本館的氣勢與人潮會被削弱，就是嘉義分院可能會淪為二流館，因為精彩的文物往往僅有一件。

為了使分院與本院有密切關係又自有特



圖二 故宮南院整體規劃構想（故宮南院辦公室提供）



圖三 故宮南院基地與週邊關係圖（故宮南院辦公室提供）

色與地位，故宮在嘉義縣太保市的分院就以「亞洲藝術文化」的新格局來做規劃。基本上有百分之六十的展品來自於台北故宮的典藏，但是在陳列的角度上不同於以大中華文化為本體的概念，而是在延續中華文化之後，跨出其範圍，以重新探索亞洲之觀點，以及

將展品放到整個

亞洲文化歷史脈

絡中的二大重點

為主軸呈現。也

因著與台北故宮

本館在藏品及展

示基準點上的差

異，故宮南院在

園區規劃與建築

主體的建構上有

著截然不同的軸

心概念：其中最

重要的精神就是

能代表本土在地

特色，並且強調

亞洲文化風情的

景觀園區設計。

（圖二）

分館在基地

的選擇上可溯及二〇〇三年，先由行政院選擇故宮南院可能的新基地參與南分院的徵選，希望能在台灣南部建立一個國家級的文化重鎮。因此，在許多與博物館相關的文化、經濟的考量下，嘉義縣成為故宮南部分院的新址。這個理想初步由杜前院長正勝與林副院長柏亨主導，於二〇〇四年二月在嘉義民雄展出「異國風情——亞洲文物展」，之後便著手進行南部分院園區的總體規劃事宜。

分館的預定地總共佔地有七十公頃之大，原先為台糖的甘蔗田區，基地位於嘉南平原嘉義縣太保與朴子東西向走廊的中間（圖三）。週邊的環境與交通，往南邊一公里處是嘉義縣的縣政中心，緊鄰基地已經完成了長庚醫療中心的首批房舍的建造，基地東邊三公里外的高鐵太保站在積極的建設當中，目前週邊的都市計畫正進行高鐵特定計畫區，西邊則進行交通大學數位內容研究園區的規劃工作，北邊川流的朴子溪和台糖舊宿舍與生產園區也在進行整建中，整體都市規劃區預計將可以吸引十三萬人口進駐。

以羅浮宮分館的建置來做概略性的比對，可看出法國在國家政策中讓大眾參與文化發展是他們主要的目標之一。延續了大羅浮計畫的逐步建置，法國政府了解到歐盟的整體發展與地方分權的概念，都必須要納入整體的文化政策當中。因此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三年間在法國文化部部長阿亞貢（Jean-Jacques



圖四 法國朗思地域位置圖 (Dr.Delahaye 提供)

(Aillagon) 的強力支持下，羅浮宮的館長羅赫特 (Henri Loyrette) 也對於羅浮宮應該推動地方文化建設的使命深表認同。在政府提出分館設立的目標後，許多城市積極地提出他們候選資格的申請。法國總理由眾多優秀的方案中決選出北方三個候選城市：亞眠、瓦隆西那以及朗思 (Amiens, Valenciennes, Lens)。在這些城市中僅有朗思市沒有任何博物館或是文化機構的設置，也基於此地不會有分館設置後帶來區域文化競



圖五 法國朗思基地狀況鳥瞰圖 (Dr.Delahaye 提供)

爭的問題，因此，在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國總理宣佈了在朗思設置分館的決定。其中與故宮分館類似的想法是：羅浮宮的朗思分館雖然大部分的展品仍由巴黎的本館支應，但是分館的定位並不想完全去「複製」一個「迷你羅浮宮」。為了讓展覽方式不受限於原先舊建築體的結構，朗思分館要創造另一個羅浮宮，讓參觀者感覺到親切，並且以更人性與新穎的方式將展示呈現給大眾，「解放」在羅浮本館中原有對於收藏品歷史的分隔與限制。

朗思市，就歐洲整體來看，它位於歐洲西北部的中心位置，這個地區，現今處在一個大的都會區當中，歷來就是歐陸利益糾葛的地域。這個城



Calais) 的煤礦探勘原爲此地的經濟動脈，也帶動著朗思市的發展，但是隨著礦業的萎縮，社會失業問題也應運而生。因此羅浮宮分館在此的設立，爲當地的居民帶來經濟復甦

市在大約二〇〇公里的等距離下，與英國、荷蘭的南部相對，緊鄰著德國、盧森堡的西邊，南部則接著巴黎的大腹地，透過高速鐵路連接，朗思到巴黎只需一個小時，到布魯塞爾一小時五十分，而三個小時就到了倫敦(圖四)。許多歐洲的觀光客經常造訪法國的北部，因此可以預見的是：朗思週邊方圓二〇〇公里內的二千七百萬民衆，都將是朗思羅浮宮分館未來的參觀人潮。博物館預定的地點原是以礦業發展著名的工業重鎮，由朗思古老的九號坑道、煤井以及六十八號矸石堆所組成，佔地二十公頃。北部加萊海峽省 (Pas-de-



圖六之一、二、三 故宮南院基地現況 (鍾增煒先生提供)



圖六 從故宮南院基地遠觀嘉義糖廠 (鍾增煒先生提供)



圖七 故宮南院建築電腦模擬圖 美國Antoine Predock建築事務所設計

的希望，廣受熱烈的迴響。(圖五)

從上述台北故宮與巴黎羅浮宮對於分館建置的區域考量來看，無疑地，一個具有開發潛能的廣大場域、容許做市鎮大規模總體規劃，並且與周圍的文化資源不會產生地域性競爭等，都是選擇該地點的要素。相信兩個博物館更殷切地希望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夠透過文化創意的產業帶來參觀人潮，並且延續、活絡在地原有的土地記憶（嘉義—蔗糖工業／朗思—煤礦工業），讓分館從初步規劃、實際的執行到未來的營運有著長遠、縝密而且激勵人心的進程。(圖六)

博物館分館的建立意味著政府、博物館方與在地的期望。政府期望以文化的涉入來平衡地域的資源差異；博物館希望藉由分館的設立將博物館的發展帶向一個新的階段；而在地的民眾則是寄望由於新博物館的成立，得以達到振興當地經濟、發展文化事業的契機。

築夢的借鏡——向分館邁進的省思

當然，博物館分館的建置在夢想起飛的一刻是值得興奮的，但在百事待興、眾人寄予厚望的過程中，更是一趟身負重任的築夢與實踐意志之旅。尤其是在博物館緊鑼密鼓籌備分館的過程中，已經建置在先的例證以及發生的現象，都是在往分館之路邁進的博物館值得借鏡與參考的。例如法國羅浮—朗思分館的設

立模式就參考了英語系國家建立分館的經驗，尤其是英國泰德美術館於利物浦的分館案例，該館於一九八〇年決定在利物浦成立分館，一九八八年正式開幕。因此，就某些已經存在或是潛在的現象是值得再思考的。

品牌效應

首先，博物館建置分館策略中必須自省與回應的根本問題是：其分館設置的使命是什麼？就故宮南院的角色而言，可預見的是，除了它是一個國家級的博物館之外，它可能還需要承載其它社會性的、政治性的乃至於商業性的多重任務。而在眾多的重要課題之中，故宮南院選擇以吸引參訪遊客為首要的短期目標，「參觀人潮的增長」，顯然是各個博物館在設立分館時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因為它所顯示的是一個可見的務實標的。而讓許多國內或是國際的觀眾趨之若鶩的是博物館知名品牌的品質保證。無論是故宮、羅浮宮、或是泰德美術館都已經享有全球品牌的形象，至於品牌的形象意味著什麼？則是見仁見智。但是在分館的建置上，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的走向與「全球古根漢」的策略聯盟思維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所訴求的不是「博物館麥當勞化」的複製；也不是運用博物館的名字來當作一種品牌以招募「加盟者」，簡言之，「商業化營運管理的思維」應該並非上述「知名品牌」博物館意欲吸引人潮的策略主軸！因

此，在這個前提下，處理把國家級的品牌推向地方的過程裡，如何讓在地的居民較有歸屬感，不讓這個藝術分享的美好經驗對當地造成「首府」對「地方」的



圖八 故宮南院基地鳥瞰示意圖（故宮南院辦公室提供）



圖九 法國羅浮—朗思分館的週邊規劃(Dr.Delahaye 提供)

了整個太保市展現亞洲意象的市鎮計畫。事實上，當分館建置成功地展現出新穎、且有別於以往的文化形象時，對觀眾的吸引力也會相對提高。因此，不管是台北或是嘉義兩地點的區隔性，真正獲益的是故宮品牌形象的整體提昇。(圖八)

威權反應，是具有挑戰性的議題。以故宮南院為例，他與台北故宮在規劃課題上是有區隔性的。但是在展示策略上，除了延伸台北故宮典藏品的展覽觸角，南院的建置並非只有建築的硬體，他所包含的是亞洲庭園園區的總體規劃，廣義且具體而言，他更涵括

聆聽當地的聲音

誠如一般大眾對博物館的認知：博物館在當代社會應該扮演重要的文化角色。而當今講求民意為重、觀眾體驗為先的博物館策略下，博物館不但是承擔文化教育的責任，更是責無旁貸的需要傾聽觀眾的聲音、並且與之對話。英國泰德美術館在利物浦的分館開展之後，意識到分館建立之初以「新的」、「專業的」、「高品質的」想法來執行的分館計畫後，卻顯示與當地既有文化的不同，而未能「融入」與在地文化成習相協調的窘境。因此，「博物館應該與既有的文化機構和觀眾有更密切的合作關係，努力去增添現存狀況的價值，而不是企圖從零開始打造自己想要的一切……」(Lewis Biggs, 2005)。在這個層面上，羅浮—朗思分館的重整計畫中投入許多人力在保存過去地域的記憶：包括將加萊海峽省的煤田列入國際教科文組織 (UNESCO)、計畫中規定保留原先在這個礦區與礦業相關的存留元素、推出新開發的計畫來讓民眾了解地域的價值與豐富性，這些舉動無非是要讓在地的居民認同政府與博物館方對於當地文化記憶的尊重。羅浮宮在朗思的都市開發藍圖中，清楚的了解到都會歷史的痕跡不應該被隔離，更不能讓一個大計畫的巨建物逕自矗立在當地，卻無法讓朝夕相處的居民對它產生認同。

「過去的礦工們對法國有很大的貢獻，法國應可

以讓他們擁有羅浮宮」、「如果我的祖父能再回到這裡，他一定對煤田可以有這樣的用途而感到欣喜」、「我們的雙眼現在所看到的是其它的可能性」等等，上述的文句全都是朗思市民對於這個計畫的期待與想法（圖九）。這些意見讓執行者更確認了他們的願景，就是重視在地聲音並與文化接軌。經濟的投資是促使計畫能夠進行的的重要因素，但是以文化作為永續的投資概念卻是讓政府、博物館方與在地有著整體文化形象提昇的三贏局面。而在地居民對於規劃的適應與參與，更是成功的基石。

結語

從本館之擴建到分館的創置，當博物館在擴張地界、延伸文化版圖的過程中，可發現到大潮流的趨勢在不同國家、地域所考量的因素有其文化與政治背景的異質性：它包含的是資金、軟硬體規劃、事後營運等的種種運作。但在博物館方建置分館、擴建新的建築體時，一些根本的同質性問題是應該被重視的。當一個嶄新與關乎在地生計的大計畫被建置時，從文化扎根與尊重在地歷史的角度而言，應該不只是在經濟的層面上鼓勵在地的居民接受它。博物館方可以更多的去發掘在地文化歷史與博物館連結的可能性；努力與當地的文史工作者、居民溝通，讓真正與這個計畫朝夕相處的居民產生認同並且引以為傲。不可否認

的，一項文化建設的成功，我們樂於見到它帶動當地經濟的起飛。而事實上，真正能長久帶動地方產業、平衡城鄉的差距，除了整體都市的配套規劃成功之外，真正能持之久遠，一以貫之的是民眾對於文化志業的認同與投入，而博物館方在與群眾雙向溝通、與彼此對話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就如同泰德美術館利物浦分館的館長所說的：「不是建築物，也非收藏品，而是人們樂於接納、並提供一個具有創作性的環境，以及積極地參與文化事務，這兩者的維繫程度，才是最重要的。」（Lewis Biggs, 2005）

參考書目

1. Emmanuel de Roux, "Le Louvre et le Centre Pompidou au grand large", *Le Monde*, mardi 30 novembre 2004.
2. Martha Morris, "Expansionism", *Museum News*, 30-35, July/August 2004.
3. Elisabeth Taburet-Delahaye, "Le Louvre à Lens: un espoir et une révolution pour la ville et son territoire",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stering Symbiotic Relations between Museums, Expositions and Local Development (Chiayi).
4. Lewis Biggs, "Tate Gallery Liverpool: its Civic Identity and Strategies for Local Participation",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stering Symbiotic Relations between Museums, Expositions and Local Development (Chiayi).
5. 林志松採訪/林惠文整理,〈面向未來的亞洲〉,《建築師雜誌》,三月號,一〇〇五。
6. 畢光建,〈浮動的嘉南平原〉,《建築師雜誌》,三月號,一〇〇五。
7. Gary Hack, 鍾增熾,〈典藏亞洲文物的寬闊天地〉,《建築師雜誌》,三月號,一〇〇五。
8. 蔡昭儀,〈從「全球古根漢」論博物館的策略聯盟〉,《博物館學季刊》,一九(三),一〇〇五。